

# 芮恩施的国际关系研究

马建标 徐 高

**摘 要：**传统观点认为，现代国际关系学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实际上在此之前，美国政治学者芮恩施已经在其导师特纳“边疆理论”的启发下，开始研究19世纪末东方问题影响下的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于1900年发表成名作《世界政治》，1911年出版专著《远东的思想和政治潮流》。芮恩施1903年领导创建了美国政治学会，组建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跨国学术网络。“美国例外论”贯穿芮恩施以“国际关系”为主要对象的研究历程，其研究虽然强调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却难以遮掩其扩张主义本质。申言之，芮恩施试图用美国文明改造中国文明，把中国变成“亚洲的美国”。

**关键词：**芮恩施 国际关系学 远东 美国例外论 帝国主义

2019年，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布赞（Barry Buzan）在剑桥大学联合推出新书《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sup>①</sup>“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概念引起国际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他们认为，“全球国际关系学”是一门旨在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从“全球”视角重新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的学科。然而，国际关系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缘何而来？如果说将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统称为“西方”是在二战以后兴起的，<sup>②</sup>那么，在此之前是否已存在某种狭隘的“区域主义”倾向，比如“欧洲中心

①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该书中译本参见阿米塔·阿查亚、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刘德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② 美国与“新西方”的形成，详见王立新：《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西方”的形成》，《世界历史》2019年第1期。

主义”抑或“美国中心主义”？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现代国际关系学诞生于一战后的1919年。但是，阿查亚和布赞认为，国际关系学的奠基时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组成“现代全球国际社会的一整套行为体”已经就位，当代全球国际社会的重要支柱——“政府间国际组织”也已生根发芽，加上正在兴起的跨国公司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共同构成了“全球性”国际关系学的“物质基础”。从这一视角出发，他们发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者芮恩施（Paul S. Reinsch）对国际关系学的奠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系列论著及开设的相关课程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的制度化”。<sup>①</sup>然而，这种“制度化”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芮恩施个人的著书立说可以起到“制度化”作用？芮恩施的学说与后来的国际关系学理论存在怎样的关联？遗憾的是，阿查亚和布赞对此语焉不详，未能解答这些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利用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会馆藏芮恩施档案及芮恩施相关论著，通过讨论芮恩施的学术传承、国家思想、世界观念和学术交往活动，力图还原一战之前芮恩施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脉络，以期复原国际关系学科的“史前史”。

## 一、芮恩施的德国文化基因

芮恩施是美国内战后出生的第一代德裔美国人，成长于美国政治学的奠基时代。19世纪中叶，德意志人在威斯康星州的影响力相当大，以至于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都把移民者选民集中起来，希望依靠他们扩充势力，“企图在美国建立一个德意志人的州”。<sup>②</sup>19世纪60年代初，芮恩施的父辈从德国移民美国。1869年6月10日，芮恩施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麦克拉肯县，3岁时随父母迁居到威斯康星州号称“德国移民大本营”<sup>③</sup>的密尔沃基市，1913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前一直在那里成长、工作。

芮恩施在威斯康星大学接受了从本科到博士的系统学术训练，其学术思想深受进步主义精神熏陶。<sup>④</sup>威斯康星大学是19世纪末美国中西部地区进步主义运动的精神堡垒。当地德国移民群体和以该校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 T.

① 阿米塔·阿查亚、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第13—14、53—55页。

② 杨生茂编：《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4页。

③ Noel H. Pugach, *Paul S. Reinsch: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Millwood, NY: KTO Press, 1979, p. 4.

④ Barbara Jean Furstenberg, “The Scholar and Public Policy: An Analysis of the Thought of Paul S. Reinsch,” 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64, p. 23.

Ely) 为代表的留德学者, 给威斯康星大学注入了德国学术文化基因。<sup>①</sup> 1899年, 密尔沃基的美籍德国移民团体向威斯康星大学捐献 3150 美元, 建造了德国哲学图书馆。<sup>②</sup> 凭借优越的藏书条件, 芮恩施研读了德国著名学者叔本华、尼采、瓦格纳等人的作品。在这些作品的熏陶下, 他的文化观逐渐形成, 提升了观察世界的思想深度。上述德国学者的名字后来经常出现在芮恩施的作品中。<sup>③</sup>

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期间, 历史学家特纳 (Frederick J. Turner) 和经济学家伊利是芮恩施的学业导师。他们拓宽了芮恩施的学术视野, 为其日后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研究打下了根基。特纳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其导师是美国“新史学的先驱”赫伯特·亚当斯 (Herbert B. Adams)。1876年, 亚当斯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即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 开创了该校的政治历史学专业。<sup>④</sup> 亚当斯的历史哲学观念深受德国学者德罗伊森 (Johann Gustav Droysen) 和伯伦知理 (Johann Kaspar Bluntschli) 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影响。<sup>⑤</sup> 受他们启发, 亚当斯认为历史与政治是融为一体、不分彼此的。他在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后提出了治学名言: “历史是过去的政治, 政治是现在的历史。”<sup>⑥</sup> 作为美国新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亚当斯进一步弘扬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科学史学”, 他的思想言行深刻影响了他的弟子。从他的研讨班里走出了后来的美国总统威尔逊 (Thomas Woodrow

① 1879年, 理查德·伊利从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关于留德学者对美国 19 世纪后期高等教育的影响, 详见梁丽:《美国学人留德浪潮及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6年, 第 134—135 页; 侯波:《学术与政治: 美国进步时代专家参政现象研究 (1900—1920)》,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年, 第 52—53 页。

② Merle Curti and Vernon Carstense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 Histo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49, Vol. 1, p. 657.

③ Paul S. Reinsch, “Japan and Asiatic Leadership,”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80, No. 578, 1905, pp. 48—57.

④ 关于亚当斯的学术生平, 详见 Woodrow Wilson to Ely, Jan. 30, 1902, Richard T. Ely Papers, 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Madison, Wisconsin; Raymond J. Cunningham, “The German Historical World of Herbert Baxter Adams: 1874-1876,”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68, No. 2, 1981, pp. 261—275.

⑤ 伯伦知理不赞成卢梭的“契约论”, 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从各方面发展国民生活。详见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Georg G. Iggers, “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 No. 1, 1962, pp. 18—22; W. Stull Holt, “The Idea of Scientific History in Americ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1, No. 3, 1940, pp. 352—362.

⑥ Raymond J. Cunningham, “The German Historical World of Herbert Baxter Adams: 1874-1876,” p. 270.

Wilson) 和“边疆学派”创始人特纳。<sup>①</sup>

特纳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期间,又把亚当斯的德国政治史、文化史研究方法和“国家有机体”学说传授给了他的得意门生芮恩施,指导芮恩施走上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研究之路。在问题意识和教学方法上,芮恩施都深受特纳的影响。1889年,特纳宣布开设一门“社会史课程”,课程大纲按照“人类文明进化的逻辑”,探讨人类从“原始社会”到“现代文明”的发展史。这在当时的美国历史学界是“前所未有之事”。特纳采用亚当斯的历史研讨班模式,训练学生阅读原始档案材料,从“历史地理”和“文明发展”的角度理解美国历史。<sup>②</sup>在特纳的研讨班上,芮恩施获得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专业的综合训练。同时,通过这一教学相长的经历,特纳形成了著名的“边疆学说”。1893年7月12日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特纳宣读了他的成名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在这篇论文中,特纳提出“殖民地之对于经济学就好比山岳之对于揭露原始成层作用的地质学”。<sup>③</sup>特纳的边疆学说也影响着芮恩施研究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和远东问题。

1892年芮恩施大学毕业之际,经特纳积极推荐,威斯康星大学高薪聘请伊利,由伊利领衔组建了“经济、政治和历史学院”。按照特纳的设想,新学院的组建就是为了发展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科学”,培养精通多门学科知识的高端人才。从1890年到1900年,10余人获得该学院的博士学位,芮恩施就是其中之一。<sup>④</sup>在特纳的指导下,芮恩施于1898年完成博士论文《美洲殖民地早期的英国普通法》。<sup>⑤</sup>随后,芮恩施到欧洲游学,在波恩、莱比锡、柏林、罗马和巴黎等地阅读、写作和听讲。在1898年至1899年的旅欧岁月里,芮恩施撰写了《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书的初稿。1899年,这份手稿帮助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政治学助理教授职位,由此开始了他作为国际政治学者的生涯。<sup>⑥</sup>

芮恩施入职后,时常对伊利说起他的“远大理想”:要把威斯康星大学所在的麦迪逊,建设成像“德国的魏玛”那样受世人敬仰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中心。伊利深以为然,表示愿意共同为此努力。<sup>⑦</sup>在和特纳、伊利、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

① Raymond J. Cunningham, “Is History Past Politics? Herbert Baxter Adams as Precursor of the ‘New History’,”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9, No. 2, 1976, pp. 244–257.

② Merle Curti and Vernon Carstense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 History*, Vol. 1, p. 638.

③ 杨生茂编:《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第13页。

④ Merle Curti and Vernon Carstense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 History*, Vol. 1, pp. 631–632, 641.

⑤ Paul S. Reinsch, “English Common Law in the Early American Coloni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899.

⑥ Noel H. Pugach, *Paul S. Reinsch: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pp. 8–10.

⑦ Ely to Reinsch, Jul. 3, 1916, Box 3, Folder 5, Reinsch Papers, 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Madison, Wisconsin.

等师长的朝夕相处中，芮恩施既吸收了边疆学说理论，又在研究中力图融合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并因其德裔美国人的跨文化身份，使得他打上了深刻的德国文化烙印。19世纪末20世纪初，芮恩施开启了他的“东方问题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作为“边疆学派”的早期传人，芮恩施沿着导师特纳指引的方向，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

## 二、芮恩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展开

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美国夺取菲律宾，拥有了在亚洲的“新边疆”。此后，美国开始超越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所规定的北美大陆边疆界限，打破“门罗主义”所划定的美洲区域空间，从“自给自足的西半球”进入广袤无垠的亚太地区。<sup>①</sup>这意味着，美国真正进入“全球政治舞台”，参与海军竞争、争夺世界霸权。其实，综合国力的增强才是美国向海外扩张的基础。1895年，美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专员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在全美教育协会年会开幕式上扬言：“我们在实力、规模、数量以及创造财富的能力上都超过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我们跻身强国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一己之力，同欧洲强国角逐对亚洲、非洲和太平洋诸岛的统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sup>②</sup>

特纳的边疆学说为美国的海外扩张提供了一种历史“依据”和“信念”。1903年，特纳提出，“在我们立国的最初25年中，几乎不断地努力使我们不卷入欧洲战争。在那个冲突时期过去后，美国才面向西部，开始迁入并开发这个国家广阔的内地……这个过程已经完结，无怪美国又卷入世界政治了。4年前，美国击败了领导发现这个‘新世界’的一个古老国家，这个革命现在还很少为人所理解”。<sup>③</sup>特纳把“边疆”视为“野蛮和文明的交汇处”，更把“边疆的流动”解释为“文明的扩张”。<sup>④</sup>他的理论受到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亨利·洛奇（Henry C. Lodge）、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伍德罗·威尔逊等扩张主义者赞赏。进一步而言，美国的扩张更张扬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种族骄傲”。1899年2月，英国诗人吉卜林（Joseph Kipling）有感于美国占领菲律宾的“胜利”，发表诗歌《白人的责任》（*White Man's Burden*），引得美国扩张主义者争相传诵。<sup>⑤</sup>

① A. Whitney Griswold,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8, pp. 3-4.

② “Dr. Harris on the Nation's Duty and Opportunity,” *Education Review*, Vol. 16, 1898, pp. 204-205.

③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1, p. 246; 杨生茂编：《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边疆学派》，第8页。

④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pp. 2-3.

⑤ Berkeley E. Tompkins, *Anti-Imper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Great Debate, 1890-192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0, pp. 236-237.

在时代氛围和导师特纳的理论启发下，芮恩施立即着手开设一门名为“当代世界政治”的新课程。<sup>①</sup>这门课被认为是“第一个可识别的国际关系学课程”。<sup>②</sup>在教学中，芮恩施沿袭特纳的研讨班模式，让学生阅读原始文献，从事社会调查活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研究能力。<sup>③</sup>芮恩施的当代世界政治课程备受学生欢迎，他的课堂上还有一小部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东亚留学生。芮恩施时常在课堂上评述包括美国、西欧、澳大利亚、俄国、日本、印度、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时政新闻，比如他认为“日本的崛起和中国的转型将会对人类文明造成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sup>④</sup>这门课程的讲义在1900年以《世界政治》为名出版，成为芮恩施的代表作。

《世界政治》一书专门讨论19世纪末“东方问题”影响下的世界形势。所谓“东方”就是指中国。在芮恩施开设“当代世界政治”课程之际，中国正处于列强瓜分危机中。美国国务卿海约翰（Hay John）在1899年秋和1900年春一再重申“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各国均沾在华商业利益。急剧变化的东方局势引起芮恩施的强烈兴趣，促使他将列强与中国的关系视为当代世界政治的核心议题，同时也是应用“边疆理论”的新领域。《世界政治》一书由此撰写完成。芮恩施讨论世界政治，旨在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他的国际关系研究并非单纯的个人选择，而是响应19世纪末美国向海外扩张的战略诉求。早在1895年，美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官员就呼吁美国高校学者要对“其他列强的国民性、发展趋势和国家利益进行最精深的研究”，从而为“驻外使节提供大量深谙他国传统和习俗的随行专家”。<sup>⑤</sup>在此背景下，芮恩施的《世界政治》可谓生逢其时。

第一，从地理空间上看，《世界政治》一书把东半球与西半球、亚太区域与欧美区域的互动纳入“世界政治”整体框架。从“全球”视角出发，芮恩施强调，远洋运输成本比铁路运输更加低廉，他坚信中国与欧洲的国际交通要依赖海洋运输，而不是即将竣工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由此，芮恩施主张世界政治的核心是国际间的“海权竞争”，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将是未来国际竞争的主战场。故而，他大力呼吁美国抓紧发展与中国的太平洋运输业，培养从事国际金融和远洋运输的贸易组织，积极推进中美贸易，而不应仅满足于搭英国人在东方的“顺风车”。从人类文明进化角度，芮恩施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领土瓜分已经

① Merle Curti and Vernon Carstense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 History*, Vol. 1, p. 640.

② 阿米塔·阿查亚、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第55页。

③ Charles McCarthy, Letter to J. Franklin Jameson, Feb. 24, 1904,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Vol. 33, No. 1, 1949, p. 79.

④ E. S. Jordan, “Reinsch and Jack London Looked East: The Vision—The ‘Most Bitter’ World War,” *Wisconsin State Journal*, Jan. 8, 1950.

⑤ “Dr. Harris on the Nation’s Duty and Opportunity,” pp. 204–205.

不合时宜，未来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将是无形的“商业市场”，竞争的关键在中国。因此，芮恩施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最符合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美国不应该在菲律宾群岛采取“排他性政策”，而应让菲律宾对世界开放。这是两全其美的政策——既可以赢得列强的友谊，又可以增强美国在中国事务上的话语权。<sup>①</sup>从更长时段看，《世界政治》中的主张随着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于“门户开放”理念的具体实施而逐步落实，20世纪初列强签订的《英日同盟条约》（1905）、《日法协定》（1907）、《日俄条约》（1907）和《罗脱—高平协定》（1908）等条约，都加入了“尊重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条款。<sup>②</sup>

第二，《世界政治》认为文化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人类文明的冲突直接影响世界和平。芮恩施认为，中国局势的演变是当时世界政治的焦点，中国发展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人类命运，“无论中国是否实现自我复兴，步入工业发展的正轨；无论俄国是否在列强角逐中获胜并控制中国政府；无论欧洲列强在华能否保持实力均衡，中国的未来注定对世界文明造成深刻影响”。<sup>③</sup>1899年12月，芮恩施在《菲律宾问题的国际影响》一文中警告，“要防止中国落入日本之手，否则西方世界将面临灾难性竞争和可怕政治后果”。<sup>④</sup>通过“文明”视角，芮恩施注意到中国文明、国际地缘政治和全球国际关系的内在关联。他认为俄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理由是俄国地跨欧亚大陆，是“东西方的调和者”。<sup>⑤</sup>面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芮恩施主张英美两国为了维持世界和平，应共同捍卫“门户开放”原则，因为英美两国“同文同种”、“心心相印”。<sup>⑥</sup>

第三，《世界政治》从历史社会学视角考察国际关系的发展规律，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互利互惠”的共同体。<sup>⑦</sup>芮恩施是一位政治学者，同时拥有深厚的社会学素养。《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的作者、著名社会学家罗斯（Edward A.

① Paul S. 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0, pp. 313–315, 324–326.

② Thomas A. Bailey, “The Root-Takahira Agreement of 1908,”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9, No. 1, 1940, pp. 23–25. 日俄《朴茨茅斯条约》与“门户开放”政策的关系也很明显，美国认为俄军占领的东北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日俄从东北撤军。详见“Text of the Treaty of Portsmouth,” *The Advocate of Peace*, Vol. 67, No. 9, 1905, pp. 208–209; Carol. L. Thompson, “America in the Far East,” *Current History*, Vol. 19, No. 109, 1950, pp. 144–150.

③ Paul S. 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85–86, 88.

④ Reinsch, “The Philippine Question in Its International Aspects,” Dec. 17, 1899, Box 23, Reinsch Papers.

⑤ Paul S. Reinsch,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Chinese Crisi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16, 1900, pp. 91–101.

⑥ Reinsch, “The Attitude of German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Box 14, Reinsch Papers.

⑦ Paul S. 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18.

Ross)对芮恩施的社会学理论修养惊叹不已,称赞他是出色的社会学家。<sup>①</sup>在这方面,芮恩施沿袭了边疆学派传统,注重各种复杂“社会力量”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特纳强调:“我们必须考虑不断变化的社会构成、固有的信仰、人民大众一贯所持的态度,以及全国不同地区的心理状态,特别是领导者的心理状态。”<sup>②</sup>芮恩施批评英法德等欧洲列强的大多数殖民政策都是“失败的”,<sup>③</sup>但这并不意味着芮恩施“反对殖民”乃至“反对帝国主义”,他只是更加“理性”和“温和”的扩张主义者。

第四,《世界政治》鲜明反对现代马基雅维利主义,主张“道德”与国际政治生活是不可分离的,反对不择手段的“国家利益至上论”。芮恩施认为,传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黑格尔国家主义与19世纪的社会进化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马基雅维利主义”,为欧洲列强在全世界瓜分殖民地鸣锣开道,比如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为了批驳好战的新马基雅维利主义,芮恩施从格劳修斯(Hugo Grotius)的“世界共同体”观念和康德(Immanuel Kant)的“永久和平论”那里找到思想武器。<sup>④</sup>

简言之,芮恩施的《世界政治》一书从全球政治空间、东西方文明比较和历史社会学角度,深入考察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力量共同作用下的全球国际关系,建立了以“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殖民政策”为主题的研究框架。<sup>⑤</sup>他的研究颠覆了国际关系学界长期存在的一个错误认识,即民族主义问题引起国际关系学者注意是较晚之事。实际上,在19世纪末,芮恩施早已对此做过专门研究。当代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国家间的互动”、“权力”、“战争与和平的变奏”、“势力均衡”等学术关键词,都可以在芮恩施的著作中找到。<sup>⑥</sup>

1901年,芮恩施出任威斯康星大学新成立的政治学系主任,<sup>⑦</sup>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对国际关系学的制度建设发挥了关键作用。最值得一提的是,芮恩施领导并创建了美国政治学会,为20世纪美国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20世纪

① Hawkins to Reinsch, Mar. 5, 1910, Box 1, Reinsch Papers. 罗斯是芮恩施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同事,1910年春他到中国考察,芮恩施在中国工作的学生霍金斯负责接待并陪同。这次考察为罗斯写作《变化中的中国人》提供了素材。详见 E. A. Ross, *The Changing Chinese: The Conflict of Oriental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China*,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11.

②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p. 322.

③ Paul S. Reinsc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5, pp. 224-225.

④ Paul S. 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6-7.

⑤ Paul S. 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14.

⑥ Brian C. Schmidt, “Paul S. Reinsch and the Study of Imp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David Long and Brian C. Schmidt, eds., *Imp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p. 48-49, 52.

⑦ Barbara Jean Furstenberg, “The Scholar and Public Policy: An Analysis of the Thought of Paul S. Reinsch,” p. 62.

初,许多美国政治学者已经认识到,必须“成立一个政治学组织,就像历史学会和经济学会那样,可以为本学科服务”。<sup>①</sup>1902年12月30日,一批政治学者在华盛顿召开会议,由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琦(Jeremiah W. Jenks)领衔,研究“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涵盖政治学领域全部问题的组织的必要性”。此筹委会由15名学者组成,芮恩施名列其中。<sup>②</sup>经过一年努力,1903年12月30日,25名学者聚集在杜兰大学的提尔顿图书馆,表决成立美国政治学会。哥伦比亚大学古德诺(Frank J. Goodnow)教授当选会长;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教授当选第一副会长,但未就任,该职位实际由芮恩施担任。<sup>③</sup>另外,芮恩施在美国政治学会成立之初就担任政治小组主席。<sup>④</sup>

1906年,芮恩施开设一门名为“东方政治”的专业课,反映了他对中国问题和东西方文明比较的浓厚兴趣。<sup>⑤</sup>进而,芮恩施将研究拓展到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上的作用这一领域。他认为,工业和科技力量推动的全球化趋势是任何国家都无法阻止的,只有进行国际合作才能弘扬“国际人道主义”,而不应在军事竞赛上无端消耗资源。<sup>⑥</sup>芮恩施还提出,各种非政府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加强国际联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国际电报联盟、国际铁路运输联盟、全球邮政协会等。<sup>⑦</sup>据芮恩施统计,当时全世界已经出现几百个非政府跨国组织,涵盖工业、政治和科学等领域。<sup>⑧</sup>在发表于1907年的有关国际组织的长篇论文中,芮恩施对国际组织数量的增长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国际组织的增加与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密切相关,与当代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的认识如出一辙。但是,当代学者很少注意到芮恩施在国际组织研究上的开创性工作。<sup>⑨</sup>

① W. W. Willoughb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9, No. 1, 1904, p. 109.

② Albert Somit and Joseph Tanenhaus,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rom Burgess to Behavioralism*, Boston: Allyn and Bacon, Inc., 1967, p. 51.

③ W. W. Willoughb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 110.

④ Barbara Jean Furstenberg, “The Scholar and Public Policy: An Analysis of the Thought of Paul S. Reinsch,” pp. 46–47.

⑤ Brian C. Schmidt, “Paul S. Reinsch and the Study of Imp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pp. 51–52.

⑥ Reinsch, “Interdependence versus Independence of States,” May 20, 1907, Box 1, Reinsch Papers. 此文的公开发表版本详见 Reinsch, “Interdependence v.s. Independence of Nations,” *The Advocate of Peace*, Vol. 71, No. 8, 1909, pp. 185–187.

⑦ Reinsch, “International Unions and Their Administr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No. 3, 1907. pp. 579–623.

⑧ Reinsch,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Law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 No. 1, 1909, pp. 1–2.

⑨ Brian C. Schmidt, “Paul S. Reinsch and the Study of Imp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pp. 48–49.

### 三、芮恩施在东方的学术影响

芮恩施的研究对东方国家产生学术影响，始于20世纪初《世界政治》一书在日本的出版。1901年，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部长高田早苗将该书列入“早稻田丛书”编译出版，定名为《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在此版序言中，高田早苗对该书内容作了简单介绍，“全书共分五编，依次是民族帝国主义、中国的开放、中国开放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德意志帝国的政略、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并赞扬此书对当代世界政治的分析切中肯綮。序言最后，高田早苗称“芮恩施是美国新进学者，大家风范，硕学大儒，此书必将永世不朽”。<sup>①</sup>同年12月此书再版时，更名为《帝国主义论》。这一版补上了目录，译者介绍一栏写为高田早苗“口译”，佐藤三郎“笔记”。<sup>②</sup>此书在日本很快成为畅销书，芮恩施在日本知识界也成为尽人皆知的名字。1909年，威斯康星大学棒球队在日本访问时发现，芮恩施的《世界政治》和伊利的《经济学纲要》在当地书店随处可见。他们由衷感叹，“威斯康星大学校友在日本的影响无所不在”。<sup>③</sup>

为何芮恩施的《世界政治》在美国出版短短一年之后就能在日本出版日文版？谁把芮恩施的新书介绍给高田早苗？目前，尚无资料对此作出详细说明，我们只能做一个大胆推测：介绍芮恩施及其著作给高田早苗的，可能是日本近代史上从事“美日学术交流”的先驱者——家永丰吉。家永丰吉与芮恩施的导师特纳、美国总统威尔逊等人同为赫伯特·亚当斯的弟子，彼此私交甚笃。1890年回国后，家永丰吉在东京专门学校政治科担任讲师，与高田早苗成为同事。1895年10月，高田早苗把威尔逊的专著《国家》(The State)列入“早稻田丛书”出版，定名为《政治泛论》。高田早苗在译者序里披露，是家永丰吉向他推荐了威尔逊的《国家》：“前几年，友人家永丰吉自美国学成归来，示其所携之The State，余读之，益觉Wilson绝非寻常之学者。遂据家永之书着手翻译，历经四载星霜，终于脱稿。”<sup>④</sup>这一时期的家永丰吉和芮恩施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和东亚政治有着共同兴趣。而且，家永丰吉还曾在芮恩施邀请下，到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系作关于东亚政治的学术报告。芮恩施对家永丰吉的讲座评价甚高，称“家永掌握了东亚局势的直接情报，他在亚

① レイニツシュ：『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高田早苗編訳、東京：東京専門学校出版部、1901年、第2頁。

② ポール・エス・ラインシュ：『帝國主義論』、高田早苗抄訳、東京：東京専門学校出版部、1901年。

③ “The Trip to Japan,” *Wisconsin Alumni Magazine*, Vol. 11, No. 3, 1909, p. 109.

④ 孙宏云：《威尔逊的政治学著作〈国家〉在近代东亚的翻译》，《史林》2016年第2期，第118页。

洲的实地考察及与日本政府的关系，使得他对东方事务的见解非同寻常”。<sup>①</sup>因此，家永丰吉很有可能如同当年推荐威尔逊的《国家》一样，把芮恩施的《世界政治》推荐给主持译书工作的高田早苗。

芮恩施的《世界政治》日文版还直接影响了梁启超对“民族帝国主义”的认识，而“民族帝国主义”观是促使梁启超撰写《新民说》的思想动因之一。梁启超撰写《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时参考了“美人灵绶所著《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洁丁士所著《平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日本浮田和民氏所著《日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理想》等书”。<sup>②</sup>“灵绶”就是芮恩施。实际上，根据日本学者小野寺史郎的考证，梁启超1901年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就有多段文字源自《帝国主义论》，也就是芮恩施《世界政治》的日文译本。梁启超只是将高田早苗的译文用中文稍作了改写。<sup>③</sup>

芮恩施的《世界政治》之所以引起梁启超关注，是因为他关于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启发了梁启超。芮恩施写道：“19世纪是民族主义的时代，而20世纪将是民族帝国主义的时代。”<sup>④</sup>这句话被梁启超译为：“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民族帝国主义全盛于二十世纪。”<sup>⑤</sup>虽然“民族帝国主义”概念并非芮恩施首创，而是明治时期在日本社会广泛流传的概念，但是芮恩施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梁启超对文明竞争的思考，由此形成他的“历史观、地理决定论、帝国主义认识”，进而使其成为近代中国新史学、地理学、国际政治学的“开山鼻祖”。<sup>⑥</sup>此时的梁启超虽然未曾与芮恩施谋面，但在阅读其著作后吸收了他的国家哲学观念。同时，梁启超和芮恩施都是德国政治学者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信徒。1901年，梁启超写道：“德国大政治学者伯伦知理所著国家学……国家者，其生命与权利受于上帝，国

① Toyokichi Iyenaga (家永丰吉), *th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and Two Thousand Miles on Horseback across Persia and Asiatic Turkey*, Madison, Wisconsin: Tracy, Gibbs and Co., Printers, 1902, p. 6.

②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新民丛报》第2号,1902年,第29页。石川禎浩认为,梁启超只是从德富苏峰那里了解到洁丁士(基丁格斯,F. H. Giddings)的名字而已,详见石川禎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04—105页。

③ 关于梁启超如何改写高田早苗译本的具体案例,详见小野寺史郎:「梁启超と『民族主义』」,『東方學報』京都第八十五册、2010年、第518—519页。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引用芮恩施著作的原文,详见Paul S. 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11.

④ Paul S. 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14.

⑤ 任公:《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1901年第95期,第1页。

⑥ 石川禎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第106—107页。

家之组织者，皆由天意受天命”。<sup>①</sup> 而芮恩施也曾写过，“‘国’这个名词……乃是从大家住在一处，接触久了生出来的；是从发展共同的风俗，语言，宗教，及成功同享，祸患同当的纪念里生出来的”。<sup>②</sup> 芮恩施其实也对康梁师徒十分熟悉。在撰写《世界政治》一书时，芮恩施已关注到戊戌变法，称赞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改革导师”。<sup>③</sup> 这些因素促使芮恩施后来与康门弟子建立了密切联系。

除了通过著作的翻译出版在东亚地区产生学术影响外，芮恩施还在威斯康星大学培养了许多东亚留学生，并鼓励该校非中国籍优秀毕业生到中国工作。比如，“威斯康星在中国”（Wisconsin in China）就是一个和芮恩施往来密切的民间校友组织。<sup>④</sup> 组织成员回到自己家乡后，继续与芮恩施保持书信往来，成为芮恩施遥观东亚形势的耳目。在芮恩施众多弟子中，霍金斯（Horatio B. Hawkins）值得一提。1901年，霍金斯还是斯坦福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在听了芮恩施的学术报告后被其渊博学识吸引。1904年，大四的霍金斯转学到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系，师从芮恩施。1905年毕业后，在芮恩施的推荐下，霍金斯来到苏州东吴大学教书，1911年12月进入中国海关工作。在中国期间，霍金斯定期为芮恩施邮寄有关中国的研究材料，如报纸、杂志和个人观察报告。<sup>⑤</sup> 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的亨贝克（Stanley K. Hornbeck）也是芮恩施的心腹门生。亨贝克在1910年到杭州之江大学任教，其间跟随芮恩施攻读在职博士学位。像霍金斯一样，他也经常为芮恩施邮寄有关中国的材料。<sup>⑥</sup> 由于芮恩施是他们的共同导师，霍金斯、亨贝克等人与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张德熙等人同样保持着密切联系。比如，张德熙曾给霍金斯去信，询问他在苏州的情况。<sup>⑦</sup>

根据现有留学生档案可知，1907年威斯康星大学招收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是来自安徽寿县的孙家鼐家族子弟孙裕方、孙季方和来自江苏的陈同寿。<sup>⑧</sup> 中国学生的到来，让芮恩施有机会研读中国儒家传统文献。此前，芮恩施主要通过在华出版

① 任公：《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1901年第95期，第1页。

② 芮恩施：《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罗家伦译，蒋梦麟校，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48页。

③ Paul S. Reinsch,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95.

④ “War Camp Work and ‘Wisconsin in China’ Will Be Subjects,” *Wisconsin State Journal*, Mar. 3, 1917.

⑤ Hawkins to Reinsch, Mar. 5, 1910, Box 1, Reinsch Papers. 这封信提到，1907年，霍金斯从上海给芮恩施寄去大量中国报纸的剪报，包括《南方报》和《中外日报》刊登的有关晚清宪政内容的时事漫画。这些剪报如今收录于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会收藏的芮恩施档案里。关于霍金斯的事迹报道，详见“Grads of 1905-1907 Return Here to Add Footnotes to History,” *The Capital Times*, Nov. 6, 1963.

⑥ “Alumni Teaching in China,” *The Wisconsin Alumni Magazine*, Vol. 12, No. 2, 1910, p. 65.

⑦ Chang Laochi (张德熙) to Reinsch, Apr. 6, 1912, Box 2, Folder 2, Reinsch Papers.

⑧ “The First Chinese Students to Be Enrolled at Madison Have Registered in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Portage Daily Register*, Oct. 10, 1907.

的英文报刊和海关英文资料研究中国问题。1909年12月，芮恩施还代表威斯康星大学参加美国政府刚刚启动的“庚款留美计划”具体方案的制订，与加州大学傅兰雅（John Fryer）教授一起拟定了美国大学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具体意见。<sup>①</sup>

截至1909年秋，威斯康星大学共有中国留学生18人，其中8人是刚入学的新生，11人的专业是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他们在学业上与芮恩施有密切关联。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周诒春和副校长赵国材都在1909年来到威斯康星大学，分别攻读教育学硕士和政治学硕士，赵国材的导师就是芮恩施。1909年10月9日，威斯康星大学中国留学生会（The Chinese Students' Club）正式成立，芮恩施指导的硕士生张德熙担任会长。<sup>②</sup>在芮恩施的推荐下，张德熙在威斯康星大学就读期间加入新成立不久的美国政治学会。在1909年举办的美国政治学会第六届年会上，张德熙宣读论文《清政府与中国的公众舆论》。<sup>③</sup>在文章中，张德熙利用霍金斯从中国寄给芮恩施的剪报，分析了中国公众舆论对晚清宪政改革的认识，认为公众舆论是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标志。之后，此文发表在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会年刊》上，引起美国学术界和新闻界关注。<sup>④</sup>由于芮恩施在中国留学生中享有盛名，1909年秋带领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到美国的领队唐国安，专门提出要会见芮恩施，交流中美留学计划。<sup>⑤</sup>

虽然芮恩施与他指导过的中国留学生群体联系非常密切，但在远东地区最早与芮恩施建立“跨国联系”的是日本学者。1900年，日本留学生就出现在芮恩施的“当代世界政治”课堂上。<sup>⑥</sup>从那时起就与芮恩施保持联系的日本学者（包括他指导的学生），除了前文提到的家永丰吉之外，还有头本元贞、松冈正男、海老名一雄、河上清和中山五郎。<sup>⑦</sup>松冈正男师从芮恩施的故事颇为传奇。据松冈正男本人描述，1905年秋他在美国读到芮恩施的一篇评论日俄朴茨茅斯会议的文章《不幸的和平》，为芮恩施的观点所折服，遂决定去威斯康星大学跟随芮恩施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sup>⑧</sup>1910年，松冈正男把芮恩施1905年出版的《殖民政策》（*Colonial*

① Printed State Bureau of Education: Admission of Chinese Students to American Colleges, Dec. 1909, Box 1, Reinsch Papers.

② “News from Wisconsin,”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No. 1, 1909, p. 15.

③ “China Goes to Washington: Chinese Admiral Will Visit Secretary of Navy,” *The Sun*, Sept. 13, 1911.

④ Chang Lau-Chi, “Government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ixth Annual Meeting, 1909, pp. 148–154.

⑤ Unknown Letter to Reinsch, Sept. 1909, Box 1, Folder 7, Reinsch Papers.

⑥ E. S. Jordan, “Reinsch and Jack London Looked East: The Vision—The ‘Most Bitter’ World War,” *Wisconsin State Journal*, Jan. 8, 1950.

⑦ Paul S. Reinsch,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1, Preface, p. viii.

⑧ 在这篇文章中，芮恩施认为，由于美英两国偏袒俄国，造成朴茨茅斯会谈结果对日本不利，是日本外交的失败。详见 Reinsch, “An Unfortunate Peace,” *The Outlook*, Sept. 16, 1905, p. 117.

*Administration*) 一书翻译成日文出版。<sup>①</sup> 回到日本后, 松冈正男致力于研究日本在中国台湾的殖民政策, 他将此归功于芮恩施在“殖民政策理论上的指导”。<sup>②</sup> 1905年4月19日, 日本留学生中山五郎在信中称赞芮恩施“对东方事务的深刻洞察, 在英美两国学术界是无与伦比的”。<sup>③</sup> 此外, 芮恩施还指导了来自印度的留学生, 如达斯(H. C. Das)和罗伊(Basanta Koomar Roy)。<sup>④</sup> 罗伊大约在1910年师从芮恩施, 后成为颇有名气的作家和记者, 出版了《泰戈尔传》和《印度的黎明》等著作, 1916年还安排泰戈尔到威斯康星大学讲学。<sup>⑤</sup> 达斯返回印度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10年9月8日, 他在信中称赞芮恩施是“当代富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国际法教授”, “影响力没有局限在麦迪逊和美国之内, 而是超越了国界”。<sup>⑥</sup>

依靠东亚留学生组成的跨国信息网络, 芮恩施在1910年开设“东方政治和文明”研讨课。浏览这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参考书目可知, 芮恩施着重从文明、宗教、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方面考察中日两国所经历的国家和社会转型。<sup>⑦</sup> 通过这门课的教学积累, 芮恩施在1911年出版专著《远东的思想和政治潮流》。值得注意的是, 书名使用“intellectual”指称“思想”或“知识精英”, 反映了芮恩施在学术语言表达上的欧洲习惯。在这本书里, 芮恩施从“亚洲统一”视角考察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和思想变迁, 将“当代亚洲的政治思想潮流”放在“全球国际关系体系”中予以审视。<sup>⑧</sup> 不过, 芮恩施所谓的“全球国际关系体系”仍然是以美国为中心, “亚洲”只是参照物和补充。这一点, 芮恩施和他的学生恐怕是察觉不到的。

1912年4月6日, 正在“海圻号”军舰上担任程璧光将军秘书的张德熙致信芮恩施: “我有幸在您的《远东的思想和政治潮流》首次上市时就得到一本。感谢您在大作序言中提到我的名字, 这是我的无上光荣。”<sup>⑨</sup> 这个“跨国私人网络”提供的东亚信息情报, 帮助芮恩施取得同时代其他美国学者无法企及的学术成就。亨贝克评价这本书帮助芮恩施扩展在东方的影响力: “1900年出版的《世界政治》让芮恩施成为国际一流的远东事务专家, 而1911年出版的《远东的思想和政治潮流》则是

① ポール・エス・ランチ:『植民政策』、松岡正男・田宮弘太郎譯、東京: 同文館、1910年、記序。

② Nasao Matsuoka (松岡正男) to Reinsch, Sept. 17, 1910, Box 1, Reinsch Papers.

③ Goro Nakayama (中山五郎) to Reinsch, Apr. 19, 1905, Box 1, Reinsch Papers.

④ Paul S. Reinsch,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 “preface”, p. viii.

⑤ “Basanta Koomar Roy,” *The New York Times*, Jun. 8, 1949.

⑥ H. C. Das to Reinsch, Sept. 8, 1910, Box 1, Reinsch Papers.

⑦ Paul S. Reinsch, *Syllabus and Bibliography for the Course in Oriental Politics and Civiliza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10.

⑧ Paul S. Reinsch,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 “preface”, p. viii.

⑨ Chang Laochi to Reinsch, Apr. 6, 1912, Box 2, Folder 2, Reinsch Papers.

锦上添花。”<sup>①</sup>1911年12月18日，芮恩施的日本弟子海老名一雄在来信中写道：“我原以为，作为美国学者，您不可能写出这本大作，但我错了。我想，您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启发日本人的思想，是由于您把德美两国的学术风格融会贯通了。德国学者擅长的系统性科研分析是日本学者最欣赏的。”<sup>②</sup>从《世界政治》到《远东的思想和政治潮流》，芮恩施在国际关系学领域的治学方法和研究理念都带有深刻的“边疆学派”烙印。1911年1月3日，特纳称赞芮恩施的新书从“社会和思想角度”研究远东问题的思维逻辑，与他研究历史问题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sup>③</sup>

由于担任驻华公使的经历，芮恩施得以在东亚进一步拓展影响力。1915年9月至11月，芮恩施、严鹤龄、伍朝枢筹备成立中国社会政治学会，并以他们三人为中心组建筹委会，负责起草学会的纲领文件。<sup>④</sup>同时，他们还各自邀请相关人员入会。芮恩施邀请他在美国政治学会的好友如韦罗贝（William F. Willoughby）、亨利·亚当斯（Henry C. Adams）、古德诺等人加入。韦罗贝是美国政治学会秘书，兼任《美国政治学评论》执行编辑，他建议仿造美国政治学会的会员制度，将中国社会政治学会的会员分成三类，即赞助会员（endowment members）、终身会员（life members）和普通会员（ordinary members）。这一建议被筹委会采纳，并获得中国社会政治学会大会通过。1915年12月5日，中国社会政治学会在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的官邸举行第一次会议，有65名会员参加。外交总长陆征祥被推选为中国社会政治学会会长，驻华公使芮恩施为第一副会长。

芮恩施认为，从世界历史看，欧美科学事业的进步都得益于“有组织的学术活动”，如英国皇家学会、美国历史学会、美国经济学会和美国政治学会等，它们在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希望中国社会政治学会借鉴美国政治学会经验，壮大学会规模，尤其应该加强对国际法、公共政策和立法、经济学、社会学、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史等问题的研究。<sup>⑤</sup>1919年5月，在即将卸任驻华公使之际，芮恩施还与美国埃文斯图书公司讨论“西方学术经典在中国”的推广计划，计划将西方书籍引入中国。<sup>⑥</sup>

① Stanley K. Hornbeck, "Wisconsin Alumni in China," *The Wisconsin Alumni Magazine*, Vol. 15, No. 8, 1914, pp. 345-349.

② K. Ebina to Reinsch, Dec. 18, 1911, Box 2, Reinsch Papers.

③ Turner to Reinsch, Jan. 3, 1911, Box 24, Reinsch Papers.

④ "Editorial Notes: The Origin of the Association,"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 No. 1, 1916, pp. 1-2. 中国社会政治学报创刊时的执行主编严鹤龄是外交总长陆征祥的秘书，编委张煜全是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详见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3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6、118页。

⑤ Reinsch, "The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Box 14, Reinsch Papers.

⑥ Edward Evans and Sons, Ltd. to Reinsch, May 2, 1919, Box 6, Folder 4, Reinsch Papers.

## 结 语

1919年9月15日，卸任驻华公使的芮恩施踏上了返回美国的旅程。<sup>①</sup>回到美国后，芮恩施在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期间修改完成《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一书。蒋梦麟在序言中称芮恩施“不但为欧美的政治学者，对于中国政治亦素有研究。所以他这本书不是悬空谈政治原理，实对于我国现行政治有切要的和建设的批评，把欧美的政治和中国的需要，明明白白的讲出来”。<sup>②</sup>这虽然只是一本介绍欧美民主制度的通识读物，却是芮恩施对《世界政治》《远东的思想和政治潮流》《公共国际联盟》<sup>③</sup>等著作的提炼，浓缩了其一直以来关于国际关系的思考。

或许是为了吸引中国读者，芮恩施在《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中引用不少儒家学说的内容。他在该书第一章结尾，特意谈到孔子对国家和政府的崇高理想。芮恩施写道，这位大哲人把政治分为三个时期：一个是“拨乱时代的政治”，为半开化的民族而设；一个是“小康时代的政治”，为已开化的民族而设；一个是“大同时代的政治”，为大开化的民族而设。<sup>④</sup>芮恩施的这段论述可以视为他吸纳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证据，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如此解说的目的，在于用中国人熟悉的概念为“种族主义”观念辩护，意在使中国人认同和接受区分不同民族“文明开化程度”的理论。

对芮恩施的评判，只有放在特定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才能显现意义。通观芮恩施的著作及言论，他的“言”与“行”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是冲突的。比如，芮恩施在1906—1910年代表美国政府接连参加美洲国家组织的相关会议，在公开场合高唱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友谊”与“合作”，但对美国政府在拉美地区推行的扩张政策三缄其口、避而不谈。<sup>⑤</sup>私下里，芮恩施还悄悄支持塔夫脱政府在中美洲的扩张政策。<sup>⑥</sup>芮恩施在其作品中时常表露出国际主义追求，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是一个“国家

① 关于芮恩施回国的报道，详见“Dr. Reinsch to Start Home Sept. 15,”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4, 1919; 保罗·S.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李抱宏、盛震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93—294页。

② 芮恩施：《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蒋梦麟序”，第1页。

③ Paul S. Reinsch, *Public International Unions Their Work and Organization*, Boston: Ginn and Co., 1911.

④ 芮恩施：《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第12页。

⑤ J. Lloyd Meche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American Security, 1889-1960*,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1, pp. 48-76. 关于芮恩施的言行矛盾，详见 Barbara Jean Furstenberg, “The Scholar and Public Policy: An Analysis of the Thought of Paul S. Reinsch,” p. 79.

⑥ Secretary Knox to Reinsch, May 3, 1911, Box 2, Reinsch Papers.

主义者”。

芮恩施本质上还是一个“美国文化优越论”的信奉者，认为美国文明理所当然地具有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1914年2月19日，美国公使馆秘书马慕瑞（John V. A. MacMurray）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描述他的上司芮恩施：“他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方便而通俗的分类法，即把世界划分为掠夺者、非掠夺者和利他主义者三个类别，后者自然也就是我们美国人。”<sup>①</sup>某种程度上说，“用美国文明改造中国文明”始终是芮恩施思想的内核。1922年1月，芮恩施在《中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的手稿中写道：“中国将很快被称作亚洲的美国。她拥有同样的大陆地貌。她的文明虽然老旧，却地大物博；她的社会制度虽然成熟，但政治上是新生的；她与我们殊途同归。”<sup>②</sup>作为“边疆理论”的忠实信徒，芮恩施沉湎于美国文明的自恋状态中。究其根本，他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服务的。他批评威尔逊总统重视欧洲而轻视亚洲，也是来自他对“边疆理论”的过度推崇。因为，“边疆理论”鼓吹“美国例外论”，否定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制度与文化联系”，把美利坚文明视为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文明”。<sup>③</sup>在“边疆理论”信奉者看来，美国文明的活力源于大陆扩张和“西进运动”，而太平洋和中国正是在美国“西进运动”的“延长线”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芮恩施提出了他的口号：把中国变成“亚洲的美国”。

正如国际关系学对自身的反思那样：“种族主义和‘文明标准’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或被抑止了，但它们是国际关系学的基础，其影响至今犹在。”<sup>④</sup>芮恩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进行的早期国际关系研究，就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

〔作者马建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徐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刘 宇）

① MacMurray to Mother, Feb. 19, 1914, Box 17, John V. A. MacMurray Papers, Mudd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② Paul S. Reinsch, “What China Means to the United States,” Jan. 1922, Box 14, Reinsch Papers.

③ 王立新：《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西方”的形成》，《世界历史》2019年第1期，第10页。

④ 阿米塔·阿查亚、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第37页。

**Paul S. Reinsch'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Ma Jianbiao and Xu Gao (184)

The mainstream perspective in the current scholarship is that the discipline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s founded in 1919,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 In fact, 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tist, inspired by his mentor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s "Frontier Thesis", had started to study global situ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mpted by the "Eastern Questio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published his seminal work *World Politics* in 1900 followed by his monograph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 in 1911. In 1903, Reinsch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found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hich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network centered around him. In Reinsch's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theme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s the focal point. Although his work emphasizes the role of China on the global stage, his approach retained an inherent expansionist nature. In other words, Reinsch tried to reshape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American civilization, and transform China into "the U.S. of Asia".

---

*Historical Notes*

**Study on the Relation among Departments, Ministers, and Court-and-Directorates after the Reform of the Yuanfeng Years in the Northern Song** Huang Guanghui (201)